

我国粮食生产是否过剩?

Problems in China's Foodstuffs

郭书田

(农业部政策法规体改司)

80年代,中国粮食产量奇迹般地形成了两个高峰,1984年总产达40 730万吨,人均396公斤,形成第一高峰,同时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经过四年徘徊,1989年起产量迅速上升,1990年达到44 630万吨,人均391公斤,达到第二个高峰,第二次出现卖粮难。1991年我国局部地区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重灾之年,粮食产量略有下降,但是没有出现粮价上涨,储备减少,反而又增加库存,粮食市场疲软。从1989年下半年以来,时间持续两年以上,仍没有走出疲软的迹象,粮价回升乏力。据农业部综合计划司200多个农经信息网点的统计,1991年12月与1989年8月相比,三种主要粮食(大米、小麦、玉米)的市场平均价从每50公斤的59.60元下降到40.37元,下降幅度高达32.37%。据中国粮食贸易公司200多个信息点的统计,同期三种主要粮食的集市贸易价从每50公斤55.87元下降到40.98元,下降幅度为26.65%。国营粮食商业议购价格则从每50公斤50.56元降为38.21元,降幅为24.43%。粮食价格总的趋势是,从1989年8月到1990年12月之前下降明显,1991年以来呈波动性平缓下跌。

粮食价格下降的同时,流通领域由于仓储设施不足,相当大数量的粮食露天存放,“卖难、调难、储难”并未缓解。国家对大米、小麦、玉米等主要品种实行保护价,敞开收购,1989年国务院委托代购专储粮243.6万吨,1990年又收购专储粮2 800多万吨。粮食保护价的实行对减缓粮食过剩有一定的作用。但因仓储能力的限制和资金不到位,仍然不能扭转粮价下跌的局面。于是,对中国粮食问题流行着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粮食已由短缺变为过剩。怎样认识粮食市场相对过剩这一现象?笔者认为:

一、暂时的相对过剩只是短缺度的缓解,并非完全摆脱了短缺的境况

在粮食长期短缺的约束下,粮食需求和粮食市场的重要影响因素都受粮食短缺的制约,形成了在粮食相对短缺约束下的均衡。因此,当粮食产量出现超常增长,粮食约束减轻时,就表现为低水平的相对过剩,这是为什么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91公斤却出现卖难的原因之一(中国人民的食物消费结构仍然是“高谷类膳食”类型)。在长期短缺下,没有想到要建立因储存过多的粮食所需要的粮仓。粮食消费水平的提高滞后于粮食占有量的提高,当粮食占有量迅速提高,并稳定在一定水平时,消费结构才会变化,并建立新的均衡状态。这与西方国家粮食生产量超过经济发展水平,被需求制约的相对过剩截然不同。1982、1983、1984年粮食产量上了一个台阶,消费量也上了一个台阶。粮食需求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持续稳定上升。这说明了粮食短缺的制约性。

二、粮食的低水平相对过剩与经济的不稳定性引起的、影响粮食供求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变化有关

1989年以来,不仅是粮食市场,国内的各种产品市场都呈现疲软状态。1989年以来,严厉的经济紧缩措施给宏观经济运行一个“急刹车”,这对粮食市场供需有双重效应。在市场需求方面,一是居民工资外收入急剧下降,同时人们对近期可支配收入的预期也下降,减少了对粮食和以粮食为原料的加工品的有效需求,如鸡蛋、猪肉价格都显著下降。二是广泛存在买贵不买贱的消费心理。三是其它工业品价格都大幅度下降,提高了粮食消费的机会成本,使需求下降。四是用粮单位在粮价上涨时多购了一大批粮食。五是经济紧缩使农

民临时工减少,从而减少了城镇的商品粮需求。在粮食供给方面,则由于银根紧缩,市场疲软,工业投资利润率减低,生产要素向农业部门转移,如在劳动力方面,外出做工的农民数量减少,乡镇企业用工减少等,使劳动力都转回农业生产部门。

三、由于粮食流通基础设施薄弱,适应能力差,不能消化短期产量波动带来的暂时过剩

80年代粮食产量和消费量的变化是粮食产量围绕消费量波动。粮食产量受许多因素影响,产量的波动既受市场和价格因素的影响,又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历史上就有“十年六丰二平二灾”之说。因此,必须增加对产量波动的适应能力。中国粮食市场建设还处在初级水平,首先反映在库存能力弱,仅城市居民消费周转需要的仓储能力已经捉襟见肘,难以应付,用于平抑波动的库存能力更是微弱。还有许多体制上的问题,如粮食部门一身二任,既承担调节市场的政府行为,又有经营的行为,还有调入调出区的利益矛盾等,使现有的库存能力不能很好利用。其次是粮食的经营组织发育不健全,国家稳定市场、平抑波动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粮食流通组织也未能起到低价存购,高价抛售的市场稳定器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波动幅度。第三,粮食的国际贸易策略没有同国内供求形势很好地衔接起来。因此,这种短期过剩现象与现行的流通体制不无关系。

四、居民食物消费仍有迅速提高的趋势

从横向上比较,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低。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分析,我国居民直接消费粮食到1986年已达到最高点,从1989年起不仅城市,而且农村直接消费的口粮已趋稳定并开始呈下降趋势。随着收入的提高,粮食消费主要反映在间接消费上,消费总量仍会上升。我国大中城市的居民粮食消费量都远高于全国人均占有量。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会迅速接近城市居民目前的消费水平。城市居民的消费潜力也远没有满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居民行为组所做的调查表明,城市居民对食品质量和数量仍有很高的提高欲望。据他们调查,在未来消费目标的12项选择中,提高食品质量的选择高达37.5%,占总选择权数的1/3以上(见表1)。

五、人均400公斤的战略目标不能改变

今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呈不可逆转的长期增长

态势。198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我国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研究》中提出到本世纪末全国粮食的社会总需求量为5 000~5 250亿公斤,按届时总人口12.5亿计,人均占有粮食为400~420公斤;如果人口突破12.5亿人的计划,则人均占有量将达不到400公斤。从目前情况和今后发展趋势看,到本世纪末总人口突破12.5亿已成定局,因而要实现2000年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的目标已相当困难。也有人认为我国的消费水平还达不到人均400公斤,于是建议降低标准,以人均占有量350公斤的水平作为2000年的计划指标。笔者认为这个建议是不可取的,到2000年人均占有400公斤粮食的指标不能降低。

表1 城市居民近期内最迫切实现的
消费目标选择(%)

	全部样本	低收入组	中收入组	高收入组
增加食品数量	81.10	11.2	8.3	6.0
提高食品质量	37.5	30.5	42.6	45.3
其它十项合计	54.4	58.3	49.1	48.7

第一,目前我国人均占有粮食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80年代以前,我国人均占有粮食一直徘徊在300公斤左右的水平。1984年粮食获得大丰收,人均占有粮食量达到396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但按我国统计口径计算,也比世界人均占有量438公斤低42公斤;若按国际统计口径计算,1984年我国人均谷物量为358公斤,而世界人均谷物量为407公斤,我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9公斤。国内外经验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社会需求呈刚性增长。目前我国正处在需求结构急剧变动阶段的起点,对粮食的需求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旺盛的增长态势。

第二,粮食是发展动物性食品的基础。

我国95%的肉、蛋等主要畜产品来自农区,近50%以上的水产品靠人工养殖,这都以大量的粮食饲料消耗为前提。我国养殖业主要以粮食为饲料来源的局面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第三,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本身仍属低水平。

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食物消费结构要有较大改善,人均占有粮食量至少要达到500公斤;食物结构要得到根本改善,人均占有粮食量则不应低于700公斤。鉴于我国人口、资源等因素限制,我国提出本世纪末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的目标显然属有所保留的低水平。据调查,目前京、津、沪三大城市人均年消费粮食已达600公斤。如果压低粮食占有水平,降低生活标准,这不仅不利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而且有可能危及国内政局,其代价

是巨大的。

六、粮食短期过剩时期的关键任务不是采取措施抑制生产而是防止产量滑坡

人们对1985年粮食产量急转而下,供需状况急剧变化还记忆犹新。当时的关于气候原因、调整结构和部分地区放松粮食生产的解释不符合实际情况。粮食四年徘徊的原因在于人为的政策失误,在乐观地估计1984年粮食形势的基础上,为了推卸日益沉重的财政包袱,采取了一系列抑制生产的措施。价格上经历了“一降三升”,即粮食价格下降,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其它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使农业投资持续减少。如此多种原因,使粮食由卖难变为短缺。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当前的任务是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在经济调整中,粮食需求增加、供给减少,重新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1990年粮食生产已经出现不良势头,与棉花播种面积和产量双增相比,粮食是播种面积和产量双减。各地方政府亦有鼓励减少播种面积的趋势。因此,在粮食丰收后,要特别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不要在农业丰收后,出现工业过热,甚至重新造成工农业比例失调。多年的实践证明,在现阶段,工农业增长率的比例不能超过3:1。但是1989~1991年,银行贷款年平均增长19.2%,流通现金年均增长14.2%,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8%的水平,基建投资规模过大的苗头是存在的。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其中工业增长14.2%,农业增长3%,已呈现出工业增长比例偏高与农业增长不协调的势头。

第二,不要在农业丰收时,过高估计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忽视农业基础薄弱、后劲不足的问题。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大致是4 250亿公斤,随着年景的丰歉而上下波动,因此,不要在农业丰收时,削弱对农业的投入,要避免投入的随意性。为了保证农业投入,我国要加速立法工作,做到随着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提高农业投入水平。

第三,不要在分析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时,忽视价格因素。1991年粮食减产,灾害的因素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市场价格疲软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与粮食“双减”(播种面积、单产)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棉花的“双增”,价值规律的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四,不要忽视我国地区的差异性,注意保护产粮区农民和政府种粮的积极性,这些地区对国家的贡献大,社会效益高,但经济效益是低的。如何充分发挥各地区资源优势,把粮食生产优势转化为商品经济优势是值得探索的。

第五,不要忽视粮食丰收,农民收入却连续三年徘徊的问题。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0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为负增长(1.8%),1990年只增长1.8%,与1989年减少相抵,1990年的农民人均收入仅比1988年增加一元钱。199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虽比上年有所增加(统计局公布的新口径计算为710元),扣除物价指数上涨2%,与城市居民收入相比,在一度缩小差距之后又有所扩大。农民收入徘徊,必然影响对农业的投入,也影响粮食市场的启动,须引起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 蔡今)

(上接第59页)

帐对比方式为主体的计划生育宣传曾经对传统生育文化转变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人口控制施行到今天,着眼于宏观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传统生育文化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已不再是“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如再以此为宣传对象,缺乏针对性;另一方面传统生育文化气氛较浓厚或复归程度较深的地区,往往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独特社区特征相联系,不加区别地宣传,效果不大。以前述的“养儿防老”观念为例,它并不是传统生育文化的特征,尽管它曾经包括这方面的内容。它更多的是人们基于现实的判断对未来作出的一种期望。如果计划生育宣传着眼于“养儿防老”是传统观念必须消除上,恐怕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应该是结合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来消除人们对未来的忧虑。再比如性别偏好问题,调查资料表明,生育意愿都倾向于需求男孩。笔者以为这不完全是传统生育文化中的“重男轻女”。传统生育文化确实包含着“重男轻女”,但是,生育意愿已转变到只要生育2~3个孩子基础上而需求有一个男孩,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传统的。其实只要稍作区别就不难认清,现在人们心目中的男性需求并非为了延续香火,更多的仍然是基于现实判断的一种期望。如果简单地宣传不要“重男轻女”或“生男生女都一样”,恐怕收效甚微。

因此,笔者以为,在政策导向上,应当结合不同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消弥传统生育文化的物质基础,而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人口控制宣传,则应结合政策所能带来的效果有针对性地消除人们对未来的忧虑。如果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不再为现实的实际问题所困扰,那么,不仅人口控制将得到更好的施行,传统生育文化本身也将最终彻底转变为现代生育文化。

(责任编辑 孙立明)